



一个军人的报告

威廉·威斯特摩兰著

一个军人的报告

〔美〕威廉·威斯特摩兰著

洪 科 译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 Soldier Reports

General William C. Westmoreland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76

根据美国纽约州加登城达布耳德公司 1976 年版译出

一个军人的报告

(美)威廉·威斯特摩兰著

洪科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5 印张 410,000 字

1978 年 3 月第 1 版 197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2·182 定价(上下册) 2.15 元

(内部发行)

第十三章 公开的见解

一九六六年春，麦克纳马拉部长关照我说，约翰逊总统正在考虑要我返回美国纽约，在一年一度的美联社董事午餐会上发表演说。战争正在进行，此刻回国在公众面前露面是否合适是值得研究的，我推辞了。那年晚些时候，我到总统的得克萨斯农场去，也是勉强的，好在其间只参加了一次类似我时常在西贡和夏威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除此之外，没有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由于麦克纳马拉部长支持我拒绝在纽约发表演说，总统放弃了这一想法。

第二年的情况就不同了。总统传话给我，要我四月二十四日在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新闻协会午餐会上讲话。这次他没有给我提意见的机会。

尽管我感到为难，我还是欣赏总统想使美国民众了解情况的愿望，特别是考虑到反战分子所散布的种种谣言。我想借此机会对美国在越南的作用作一次严肃的、权威性的说明，这样做或许有助于挫败北越人为动摇美国决心所作的努力。不管怎样说，我的总司令已经下了命令，任务就得完成。

我做回国准备的时候，总统并没有提示我应该讲些什么。他最多也不过是通过惠勒将军顺便传话说，他将欢迎我强调一下我在西贡记者招待会上所谈到的一些事情，如果我愿意这样做的话。又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总统预料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会发表演说要求再次停炸，他就暗示我可以预先表明我的看法。

在任何一场争论中，包括停炸是否适当这个问题在内，我对我说过的话充满信心，可以说，我的为人是光明磊落的。一个军事指挥官当然有权力，甚至有义务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支持国家政策的意见。只有象麦克阿瑟在朝鲜所做的那样，试图通过公开声明而不是通过指挥系统来谋求改变政策，那才是越轨行为。参议员肯尼迪想要停炸一周，如果这样做未能促使北越人坐下来谈判，那就无限期地继续停炸。对这种停炸，我是不难表示看法的：这就好象一头骡子不肯吃这根胡萝卜，那就再给它一根，接着再给它一根。

为了适应西贡和纽约之间的时差，我找了个机会先到西点军校，在那里稍事休息，并在一个晚上向学员作了非正式的讲话，然后同基齐和我的女儿史蒂薇驱车前往纽约。午餐会开始前，在华道夫饭店外面的反战示威者开始焚烧我的两个模拟像，但是使他们十分扫兴的是，有一个未能点燃。尽管如此，看到自己的形象在火焰中焚毁，还是令人伤感的。正好在几个星期以前，当史蒂薇看望哈佛大学的一个朋友时，她被其所误认的校园篝火吸

引住了，结果却发现是她父亲的模拟像正在燃烧。直到几年以后，史蒂薇才把这件事告诉我。

（史蒂薇有时显得比她的年龄成熟。例如，当她被邀请作为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市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苹果节皇后时，她断然谢绝了。当她的父亲正在一场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的战争中指挥美国军队时，她认为参加无聊的社交活动于她是不适宜的。）

在华道夫饭店午餐会上，我对记者协会的理事们所发表的演说，着重谈了下述内容：北越对叛乱的支持、北越军队介入的情况、敌人的恐怖和屠杀政策、我们为避免平民的伤亡所作的努力、南越人的勇气和美国士兵的鼓舞人心的范例。我说：“虽然军事形势是喜人的……但是距战争结束仍然十分遥远。”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后回答一个问题时，作了详细的说明：“今后的问题是，我们应尽一切可能对敌人施加最大的压力。我们要消磨敌人。事实上，我们正在打一场消耗战，而唯一的代替办法是打一场歼灭战……。”

我在正式演说中指出，按照敌人的观点，军事战役只是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正在进行的一场持久的、密切配合的攻势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已经看到他们取得成功的征兆。我说：“敌人将心理战和政治战巧妙地结合起来”，已经赢得了全世界公众的支持，“这就使他们有可能以政治手段取得他们用军事手段所不能取得的胜利。”我指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生灵涂炭。

为了指责最近在中央公园里公开烧毁美国国旗的行为，我决定在我原来的讲稿中补充一个内容。我说，在越南作战的美国人，“我也不例外，都为最近国内所发生的非爱国主义行动而感到心寒”。

最后这一句话几乎没有例外地成了新闻记者和评论家所强调的一项内容。例如，《华盛顿邮报》关于这篇演说的报道的第一段就说：“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今天说，国内的反战抗议活动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美国人的威风。”《华盛顿明星晚报》的一位记者说我“痛斥反战示威者”。肯塔基州的参议员思拉斯顿·莫顿说，我对烧毁国旗、兵役证的行动与持不同政见的合法行动，不加区别地使用“非爱国主义行动”这个字眼，这只会给关于战争问题的争论火上加油。虽然我后来在西贡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不反对合法的不同政见，但不知道我的话对那些觉得逆耳的人是否起作用。

那天下午在纽约，我在外交委员会的演说中，进一步阐述了我午餐会上的意见。当时我高兴地注意到在听众中有两个对处理美国对越政策问题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麦乔治·邦迪和迈克·福雷斯特尔。我在强调了战争的各个方面——政治、社会、心理、经济和军事——之后，得出结论说，战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治。我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是，政治也是战争的继续。”

基齐和我在当天傍晚飞往南卡罗来纳州去看望我在

哥伦比亚市的母亲和妹妹。在那里，我接受了罗伯特·麦克奈尔州长的邀请，向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发表演说，并且高兴地陪同我年迈的母亲走进议会大厅。我利用这一机会赞扬了在越南服役的南卡罗来纳人，并且指出黑人士兵在服役中的表现“同他们的白人战友一样，也很出色”。这似乎是不关痛痒的乏味之谈，因为这已经时过境迁了；而且当时在那个大厅里，除站在后排的工友外，连一张黑面孔都看不到，这些话肯定会使某些听众感到意外。

那天下午，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授予我荣誉学位。我刚刚开始致辞，就见一个年青人站了出来大声抗议。他带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战争博士”。我继续演说时，眼睛一直盯着他，他很快就溜走了。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的目光逼人，而是其他听众对他有明显的恶感。这个抗议者是一位化学讲师，后来他写信给我，对其示威行动使我个人遭到侮辱，表示歉意。

在听众中有该大学的一位橄榄球教练保罗·迪茨尔。在仪式结束后，我们做了简短的交谈，回顾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责成我改变西点军校橄榄球队的落后状态，并把迪茨尔调到该校担任教练一事。迪茨尔的调动当时在某些人士中引起了非议，因为他离开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时聘书尚未到期。但是，对于迪茨尔与我的洽谈，该大学校长特罗伊·米德尔顿是完全了解和赞同的。遗憾的是，就是保罗·迪茨尔也未能设法压倒海军队在那几年的优势，因为这个队拥有出色的四分卫罗杰·斯托

巴赫。

四月二十六日，基齐和我飞抵华盛顿，当晚到白宫约翰逊总统和总统夫人那里作客，又一次受到了他们的得克萨斯式的款待。我一到首都，立即给五角大楼打电话，要求给我派几个演讲稿起草人。因为我在即将离开哥伦比亚时获悉，总统要我在四月二十八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我来不及亲自起草演讲稿。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我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里两次晋见约翰逊总统。在座的还有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副部长万斯、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沃尔特·罗斯托。

在这一天的两次会议上，讨论了向越南增派美军部队的可能性。鉴于我们用为数不多的美军部队（相当于八个美军师略多一点）在一年半稍多一点的时间里所取得的军事胜利，我认为如果能得到更多的美军部队，就有可能加强作战行动，从而早日完成美国的使命。我考虑，如果增加兵力可以加速作战进程，那么部分地征召后备役部队是值得的；如果我还能获准开进老挝、甚至柬埔寨，并在非军事区以北进行两栖攻击，那么，征召后备役部队就更为合情合理了。扩大胜利历来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军事原则。

在来华盛顿之前，我在原已批准的使一九六七年的兵力达到四十七万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两个增派美军部

队的方案。一个，我称为“最低限度的”兵力方案；另一个是“最适宜的”兵力方案。

最低限度的兵力是指增加二又三分之一个师和五个战术战斗机中队，即增加八万零五百人，使总兵力达到五十五万零五百人。我认为这是在南越境内坚持和扩大作战行动必不可少的兵力。最适宜的兵力是指增加四又三分之一个师和十个战术战斗机中队，连同支援部队在内共需增派约二十万人，使总兵力约达到六十七万人。我认为这样就可以在南越境内更大规模地展开作战行动，而且还有余力对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敌人作战。

在长时间讨论这两个建议过程中，我感到总统倾向于征召后备役部队，但是麦克纳马拉部长不太同意，而且除了沃尔特·罗斯托外，谁也不太热衷于到南越境外作战。罗斯托解释说，如果派出更多的部队，决不是让他们从事一般的作战，而是让他们取得惊人的、引人注目的战果，比如在非军事区以北实施两栖攻击，就可能取得这样的战果。很明显，最后对增加部队的问题并没有在短期内很快作出决定。

讨论将近结束时，麦克纳马拉部长一定要我判断一下，按照这两个方案“结束我们的卷入”各需多少时间。我最后说，假定对北越和老挝狭长地带的空袭将继续进行，“使用最适宜的兵力，大约需要三年；使用最低限度的兵力，至少需要五年”。

处理任何象战争这样不可捉摸的事，我不愿作出预

断。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不由得使我对第二个预言的准确性——无论这是否出于巧合——感到惊讶。因为总统最终批准的几乎正好是最低限度的兵力，而在五年以后，果然全部美军撤出了越南。

那天晚上，基齐和我搬到惠勒将军和惠勒夫人家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梅尔堡第六区的官邸）。同一些高贵的客人共进晚餐之后，我才回到自己房间里去研究我第二天的演讲稿，这时已经接近午夜了。当天下午我曾阅过这篇稿子，并且要求修改，可是执笔人没有理解我对他们的要求。我很焦急，再过几小时我就得到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了。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改写大部分演讲稿。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既要给我在越南的士兵以应得的荣誉，又要使国会和美国民众产生我认为对打好这场战争所必需的那种情绪和希望，而又不致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

在基齐的帮助下，我开始工作。后来她不得不丢下工作去睡了。我仍然继续工作，直到最后我的眼睛也睁不开时为止。清晨五时，我醒来，睡眼朦胧的基齐又帮了我一会，总算完成了这件工作。

我穿衣服的时候，传令兵急忙将我的最后一稿送往五角大楼。我想要回手稿在电视机上草草练习一遍，当我到达那里时，手稿还正在打印。

某些人报道说，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由一个战场指挥官向国会发表演说，这还是第一次。我在这次演

说中说，在越南的盟国军队将会占优势。同往常一样，我有意回避使用“胜利”这个词，因为美国的目标不是在军事上战胜北越，而是由我们提供“保证越南共和国能够得到发展和繁荣的安全盾牌”。我提醒大家，敌人认为我们的唯一致命弱点是我们的意志不坚。之后，我赞扬了我所指挥的美军部队：

我们在越南的士兵、水兵、飞行员、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岸警卫队员是我国培育出来的最优秀的人……他们了解这场冲突的意义以及他们作为战斗员和建设者的双重使命。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祖国的决心、信心、耐心、坚定性和持续支援为后盾，我们将在越南制服共产党的侵略。

演说期间和演说后的欢呼声与掌声是热情而令人鼓舞的。虽然我意识到我是代表我所指挥的官兵接受这种欢呼，可是由于欢呼声连续不断，我越来越感到局促不安。怎样结束这个场面呢？我不由自主地转向主持会议的官员们——参议院议长、副总统汉弗莱和众议院议长、众议员约翰·麦考马克——向他们敬礼。我离开会议大厅时，掌声仍然持续不断。

对我的演说，不难想象，反应是各种各样的。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表示称赞；另一些人高兴地注意到我没有讲不同政见的问题；有些人则怀疑，战争还在进行，此刻我向国会演说是否恰当，他们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是把推上了政治舞台去支持一个素有争议的政治决定。对

这场战争一贯持批判态度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认为这是“一次好的演说”。他说：“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演说是精彩的；问题在于把我们的青年送到越南去的那种政策。”之后，我曾邀请富布赖特参议员访问越南，但他始终没有去。

我离开国会到白宫，总统为我举行了午宴。客人中有国会领袖、大部分州长和内阁成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作战时就是我的、也是美国军人的一位老朋友马撒·雷伊小姐，当时正在百老汇演出，也匆匆赶来在午宴上招待我们。在国务卿腊斯克就外交方面的一些倡议作了讲话之后，总统叫我发言，我作了即席发言，力求较详细地说明这场战争的性质。

那天下午，基齐和我乘飞机到北卡罗来纳州费伊特维耳作短期逗留，探望她的双亲。然后，遵照约翰逊总统的嘱托，又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棕榈沙漠”，拜访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夫妇。这是一次亲切友好的会见。这位前总统把他画的一幅他孙子戴维的画像拿给我们看。他告诉我们，就在几天以前打完一场高尔夫球之后，鲍勃·霍普告诉他说，他明白了为什么他用更多的时间去画画而不打高尔夫球。他说：“可以少费点劲。”

在作客期间，艾森豪威尔将军再三说，我的任务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任务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他说他曾劝约翰逊总统给我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人力。一九六六年在白宫会见总统及其内阁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说过：

“如果是用部队完成任务，你就必须投入使战争胜利结束所必需的兵力。”他强调指出二十多年前欧战的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的指令的简明性。该指令说：“你要进入欧洲大陆，与盟国一起作战，打到德国的心脏地区并歼灭其武装力量。”

艾森豪威尔将军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对华盛顿给越南战争所横加的种种限制感到遗憾。

数月之后，即在七月，麦克纳马拉部长来到西贡进一步讨论兵力问题，我希望对我的请求作出决定，这时，我接到我亲爱的母亲逝世的消息。她终年八十一岁。死前她一直很清醒，要了一杯咖啡，只喝了一点就闭上了眼睛，好象睡着了似的。她死的时候象她在世时一样，安详而又恬适。

此时，基齐和孩子们刚刚探望我的母亲和她的双亲归来到达夏威夷，我在那里同他们会合，又一同飞回哥伦比亚，于七月十二日在那里举行了葬礼。州里的官员们给予我妹妹和我本人的照顾使我感到欣慰。他们当中有州长、两位参议员和议会代表团的几位成员。我的至交、前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专程从纽约飞来吊唁。参加葬礼的还有詹姆斯·贝尔纳斯，是他推荐我到西点军校学习从而使我开始了军队生涯的。

总统直接给我发来了电报，这是罕见的。他向我表示哀悼，并说：“希望能在你回西贡之前见到你。”于是，基

齐和孩子们同她的父母留下来，我飞到了华盛顿。

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然后通知我说，他已经决定采纳我的两个增兵方案中的兵力较少的那个方案。他的主要着眼点，显然是为了避免征召后备役部队。我的“最适宜的”兵力方案是需要征召后备役部队。对这个方案，开始是约翰·麦克诺顿和阿兰·恩索文反对，之后扩大到一些文职官员，最后扩大到麦克纳马拉部长。结果就连“最低限度的”兵力也大为削减，几乎砍掉了一半，给我增加的兵力只有四万七千余人，总兵力不超过五十二万五千人的限额。

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大量增兵，完成任务的时间将会延长。但是我理解总统身上的压力之重，而且在提出这两个建议时，我自己也表示过，如果采纳最低限度兵力的建议，目前还过得去。第二天，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并说派出的兵员数目对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表示同意；但是我在私下里向他说明我保留在必要时要求增兵的权力。战争是太变幻莫测了，除此没有别的办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约翰逊总统再次召回我和邦克大使，表面上是为了进一步商讨问题，实际上是想平息公众的情绪。当时报刊上和国会里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强烈。群众的反战示威活动也在增加。例如，十月份约有三万五千名示威者包围了五角大楼。对于一个有声望的

行政官员来说，踏进大学校园是危险的，象麦克纳马拉部长在哈佛大学的痛苦遭遇就是一例。

在回华盛顿途中，我再次接到约翰逊总统要我下榻白宫的邀请。基齐和玛格丽特当时同我在一起，里普在夏威夷读书，史蒂薇在马萨诸塞，但后来她有时也前来和我们一起在白宫居住。总统和第一夫人对我们关怀备至。例如第一天晚上，他们一定要我们在我们专用的二楼餐厅里宴请客人。我们请了基齐的两个兄弟，陆军中校埃德温和弗雷德里克·范杜森以及他们的妻子，大家一起在楼上吃了饭。

第二天，十一月十六日，我特别高兴地参加了白宫的一个授奖仪式。总统授予我的一个部属，原第一七三空降旅的文书军士查尔斯·莫里斯一枚荣誉勋章。莫里斯在越南负伤住院期间，我曾数次探望过他。他不顾胸部重伤，干掉了敌人一挺机枪，接着他又指挥他的排进行激烈的战斗，他冒着敌人的火力照料他的伤员，并且不顾再次负伤，匍匐前进，越过排的防御阵地干掉了另一挺机枪。他身材瘦长，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站在白宫却显得威武而自豪。当总统请我讲几句话时，我赞扬莫里斯军士是美国在越南的坚强战士的代表。

在我回国的头几天里，我和麦克纳马拉部长、惠勒将军进行了会商，并且出席了参议院和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会议，我还安排录制了和史蒂夫·罗恩的会见，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电视节目。十一月十六日的晚上，

应总统临时发出的邀请，我和总统以及众议院全体民主党议员共进晚餐。

我正在刮脸准备赴晚宴的时候，总统的女儿林达·罗布问我，她是不是可以进来谈一谈。她很烦恼，白天一个采访记者曾经问她，如果她的丈夫查克在越南被俘并且被扣作人质，总统会怎样做。这是一个折磨人的问题。我试图解除她的顾虑，我说，查克当步兵连长时是有某些危险的，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团的参谋了，处境也就安全多了。她似乎放下了心。

在总统邀请我赴晚宴之前，基齐和我在约翰逊夫人的催促下，请了五对夫妇同我们在二楼餐厅共进晚餐。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至交。他们是：乔·穆尔和他的妻子维尔·乔，基齐（她是去年夏天离开越南的）的教父迈克·麦康尼和他的妻子马戈，马特和佩特·马西森，伊丽莎白和查尔斯·巴尔泽斯以及塞西尔和斯科蒂·斯特朗。好几位太太都因为接到邀请太晚来不及理发而感到遗憾。只有斯科蒂·斯特朗在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烘干头发。她丈夫是一位炮兵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布雷格堡时就是我的亲密朋友。斯科蒂非常得意，其余几位太太都很羡慕她。

在我们的私人宴会开始之前，约翰逊夫人同基齐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喝了鸡尾酒。当有人称赞房间的装饰美观时，约翰逊夫人说：“这座可爱的房子还有许许多多小的妙处，这一切都得感谢肯尼迪夫人。”她比任何人都